

龔 雋 著

江燦騰主編

佛教文化叢書 10

禪學發微

——以問題爲中心的禪思想史研究

新文豐出版公司

佛教文化叢書⑩

龔雋 著

禪學發微

——以問題爲中心的禪思想史研究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公元二〇〇二（民國九十一年）年五月臺一版

佛教文化叢書一〇

禪學發微

——以問題為中心的禪思想史研究

精裝一冊基價一六·七元正

版權



所有

著作者 龔 本 釗 雋
發行者 高 本
印刷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二二〇六〇七五七・二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二三四一五二九三・二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傳真：二三五六八〇七六・二三〇二三八七〇

* 本書若有破損或缺頁・歡迎寄換 *

22934018 (精)

網址：<http://www.swfc.com.tw>

E-mail address：swfc@swfc.com.tw

佛教文化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構想，最先是由新文豐出版公司的負責人高本鈞先生提出的。高先生認為，台灣佛教在現階段有必要規劃一套新角度的文化叢書，以提供廣大讀者的需要。因為台灣佛教的發展，目前可以說已達前所未有的全盛時期，各界對佛教界的期待也相對提高許多，因此佛教出版界有必要針對此一社會需求，提供一系列包含思想、歷史、藝術和社會關懷等內涵的文化叢書。而承高先生厚愛，委由後學的我，來擔任主編的工作。

但是，瞭解國內佛教學術現況的人都知道，由於實際上有能力撰寫高水準作品的佛教學者並不多，再加上主題範圍要求多樣化和現代化，所以在約稿時，必定會遭到極大的困難。而且，在國內現有的成名學者裡，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大堆稿債要還，要能得到彼等的時間允許和構思出新的題材，則更不知要等候到何時。因此，本叢書的主編，便難以照預定的計劃，在短時間內一一完成；而必須採取機動式的調整，視撰稿人的情況，來決定簽

約、文稿和出版的時間。所以，對本文化叢書有期待的各界讀者，在現階段暫時仍無法獲得完整的出版目錄，而必須留意本叢書今後陸續發佈的出版訊息。這是要先請讀者諒解的一點。

不過，儘管如此，我個人既然擔任主編，便一定盡最大的努力來進行。在約稿時，儘量注意稿件內容的學術水平和主題的多元性。我不敢說，我約的稿件篇篇都是頂尖的。但是，我可以保證，在現階段，那是我所能約到的最理想的稿件。我相信，我個人在過去幾年的學術研究和對作品水平的要求，應是圈內人都或多或少瞭解的，也因此，我自信本書的出版，將不致於讓愛護我的讀者失望。所以在此請讀者支持，並期待本叢書各冊的相繼出版。謝謝！

江燦騰謹誌於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八日

作者簡介

龔雋，男，一九六四年生，江西南昌人。一九八七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圖書信息系，獲文學學士學位；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三年，分別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武漢大學哲學系，主攻中國哲學史方向，並獲得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一九九三年至二〇〇一年，就職於廣東華南師範大學哲學研究所，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兼所長。二〇〇二年調至中山大學哲學系任教授，同時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教育部佛學與宗教學理論研究基地」兼職研究員，台灣中華佛學研究所客座教授，《學術思想評論》、《東方文化》等學術刊物學術編委，二〇〇二年度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者。近年主要從事中國禪學思想史及近現代中國佛學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

內容提要

本書主要收集了作者近年來關於中國禪學思想史研究的若干論文，這些論文均以問題爲中心，並在融入日本和英語世界禪學思想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基礎上，比較自覺地運用現代學術史的敘述方式，把中國禪學思想，特別是宋以前中國禪學思想中許多重要和複雜性的問題置於新的脈絡中來進行梳理和詮釋。本書對於傳統漢語世界的禪學研究成果，在充分吸收的基礎上，有不少的突破。無論是在問題的擇選、論述的策略和方法上，都爲漢語禪學史的研究開拓了一些新的論域空間和寫作方式。對於禪學思想史上一些傳統的爭論性問題，如南北禪的頓漸之爭等，也從新的視角上尋找到了切入點，把問題的研究作了進一步的引伸和推進。書後的附錄，則試圖在更大的佛學研究的視域中，以現代漢語佛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爲中心，對此進行了細密的批判性分析，以期漢語佛學研究可以開出一新境界。

English Abstract

This book gathers several papers on conceptual history of Ch'an written in recent years. They reinterpret some important and complicated issues of Ch'an thought, especially before Song Dynasty, by the way of putting them in a new context and subjects. Absorbing fully recent Ch'an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Japanese and English, the author centered on more problems of Ch'an idea than history and took various written tactics of modern scholarship, including some analytical theories of text, so a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discussions and break through the existing limits of Ch'an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these papers also try to open a new way of discourse and research methods. It is certain that they will deepen and push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such as sudden and gradual enlightenment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sects, the particular treatments of canon by Ch'an master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freedom and precepts, etc. The appendixes to the book deals systematically with and analyzes critically the Buddhist methodology of Chinese research. The author believes these discussions will help the readers to creat a new vision of Chinese Buddhist research.

自序

單是從數量上看，近十多年漢語世界出版的汗牛充棟的禪學史研究，雖無法與日本同仁的規模相比，卻也可以讓我們驕傲一陣子。慣於定量或計件式的成果運算，經常在為我們帶來額外驚喜的同時，也造成一些習焉不察的錯覺。畢竟，學術不能僅靠數頁碼和統計數字來論高下，學術問題的推進和知識的增長才是精神生產的價值衡準。不能說漢語禪學史的研究缺乏典範，從胡適、湯用彤、呂澂；一直到印順於七〇年代出版的禪學研究，都具有相當的典範性，問題是這些「香火」為什麼沒有在後續者的禪學研究中持續下來？數量上是層出不窮，而格局上卻只能「照著說」而無法「接著說」。新的材料雖略有續出，而現有研究一面在對材料的技術性處理上，缺乏相當專業化的學術（如文獻版本學、文字學和比較文字學等的訓詁考釋）支持，同時也不具備富有詮釋力量的解釋策略，這些都頗能夠讓我們同情地回想起章學誠講的「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這句話的意義。

也許漢語禪學史的研究已經到了「範式革命」的時代。從八〇年代以來一般中國思想史

的研究經驗看，現有中國思想史的研究相對成熟，乃是經歷了從師夷長技和重新輸入學理，回到思想史和學術史「本土化」的轉移，這裡面有相當複雜而曲折的思想和學術史的觀念和方法問題。禪學史的研究則有些例外，它的問題和方法基本都是在一般中國哲學史、文化史和沒有經過現代學術批判和反思的歷史學的現有框架內來進行的，因此它既不太貼近禪學本身的話題，也於材料的處理上流於一種傳統歷史書寫方式的狹隘模式。而與上一輩的一流學者相比，八〇年代以來的禪學史研究最缺乏的，是我稱作的對於「史料的感覺」。從大量缺乏解釋性和讀起來極其生硬、缺少生趣的文本研究來觀察，中國禪史中許多最具有詮釋價值和緊張感的問題，要麼是根本沒有被觸及，要麼就被非常輕率而又似是而非地打發掉了。我們似乎一直在用漢語進行思考和寫作，而由於無法切近禪思想的歷史經驗，使我們的知識研究變得好像越來越遠離母語，於是，我們現代禪學研究的處境就變得有些尷尬：傳統和本土意識中那些親切的體會和感覺深度被一種其實並不現代的現代學術所遮蔽了；另一方面，對於西方學術史的隔絕，又無法借重西方學術史的見識、方法和手段來整理我們的材料和激發出更有意義的問題。客觀點看，佛教中最有本土化色彩的禪宗，如果從學術史的研究來說，已不再是什麼國粹了。這樣說，並不是成心要給現代漢語禪學史的研究潑涼水，也絕不是想在我們經營已久的這塊「自留地」上鼓吹販賣洋貨的事業。

如果我們還具備開放一點的能力，就目前的狀況言，我們實在很沒有資格去訕笑洋人的

禪學史研究。「禮失而求諸野」，對於現階段漢語禪學史的研究，「輸入學理」或許是不可避免，當然也是相當複雜的一個過程。應該說，現有漢語禪學中比較規範的研究大抵是在跟進日本禪學的相關進度，但主要的還是因襲，我們並沒有形成自己鮮明的問題意識和自覺的方法手段。必須警惕的是，日本禪學研究所表現出的強勢背後，也隱藏了不小的流弊，正如許多西方學者，像 Bernard Faure 和 Dominick LaCapra 所批評的，他們很少關注其他和更為現代性的方法，總是依據非常狹隘的文獻方法，而這種「文獻知識模式完全無視其自身的修辭性質」，這一點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漢語禪學研究的那些模仿者。八〇年代以來西方世界的禪學史研究，不僅超越了早期鈴木大拙那種哲學為主的書寫方式，還廣泛消化了日本現代禪學史的最新成果，文獻和解釋技術方法上的成熟，使他們的研究雖在規模上還無法與日本同行比肩，而從嚴格學術史和思想史的意義上，反有相當的論述更切近於禪學內部的問題和脈絡，可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

原則上講，假西方學術方法來發掘淘煉中國禪的思想，依現代學術規範來說，是一條無法繞過的路。重要的是當我們以此進入傳統禪學思想的歷史時空，必須保有一種緊張和限制，必須意識到並非所有禪學的問題都能夠簡單納入西方學術的框架來進行論述。保持適當的張力，這對於一位學者當然非常不容易，甚至在不少很有素養的學者那裡，我們仍然感受到這種緊張的強度。而且，我認為這種張力在禪史的研究中還會持續下去。從積極的方面看，這

種緊張在為我們製造限制的同時，也給我們增加了可詮釋的空間。尤其對於漢語世界的學者來說，本土歷史經驗的資源如果得到恰當的處理，將可以補充我們在詮釋技術上的不足。西方禪學研究的最大困難，在於他們很難進入禪的歷史經驗，因此儘管他們可以把史料的處理和詮釋的策略發揮到極致，而於一些關鍵性的觀念處理，未免隔靴搔癢。正是因此，像印順、呂澂那樣把佛教經學傳統的歷史經驗帶入禪史的研究中就有了更加特別的意義。雖然我們可以批評他們在某些史料的把握還不像西方和日本學者那麼精細，但他們對於意義的貼近和由此內在性地展示出的卓越詮釋洞見，則表示了其不可替代的價值。這就是我為什麼一再鼓吹重視近代以來佛教經學的傳統，而對「洋格義」，則雖持守樂觀，但也是謹慎的態度。困難在於，這種歷史的經驗雖不像禪的宗教經驗那樣深秘，卻也不是透明的，因此，如何在掌握現代學術的技術和規則的同時又能夠進入這一歷史經驗或感覺，對於後一輩漢語禪學史的學者來說，就是一種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機遇。我們離這一目標還有相當的距離，但構築於我們生活的歷史世界、語言世界和在地感，無疑給予我們比洋人更多的優勢。

這些是我近年來在選擇和撰寫中國禪學思想史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具體工作的開展其實更為複雜和現實。比如在禪史頓漸問題的處理，如何把漢語傳統形成的「南頓北漸」的基本架構和日本，特別是西方禪學研究所發現的完全對立的結論進行統合，就頗費周折。這裡既要照顧他們提出的新史料的運用和問題的解釋脈絡，又要在他們所建立的，已經多少規範化

了的論述方式內去重新「感覺」新舊史料背後的、更深細的內涵以及與傳統說法之間的某些關聯性。又如在論述禪宗與經典關係時，我參考了西方思想史上經典與宗教經驗關係的相關研究，但進一步的比較發現，西方的這種類似經驗範式雖然具有很強的解釋性，卻不能直線式地移用於禪學內部的狀態，中間必須經過複雜的轉換，因為無論禪師的經驗或是經師的注疏都無法簡單納入一般的宗教經驗和知識對立的二元格局中來讀解。

在寫作形式上，我有意識地擺脫現有漢語禪學史所通行的通史性的敘述方式（包括斷代史的寫作），而是以問題為中心。這並不是說通史性寫作沒有價值，而是在我看來，現有禪學通史性的寫作程序中，不少地方是在製造常識性和重複性的知識敘述，而化約了禪思想史中最有緊張性的問題。就是說，這類寫作無從把禪思想史問題化。這樣的結果就好像鑿井打水，忙著到處開井口，卻不問是否打到水。所以我並不想急於做禪學思想史的宏大敘事和整體結構的改造，而是以論文的方式去面對和開發一個個具體問題。在問題的選擇方面，我也不是一味選擇偏冷或沒有人處理的問題，這不是我問題意識的原則。我的想法是，儘量挑選禪史上最有緊張性的話題來進行研究，那怕有些話題已經被認為沒有開發的餘地；這除了滿足我個人的學術興趣和「野心」，更重要的，是在於釐清這些問題可以幫助我們對禪思想有深入的了解；況且，熟悉或談得很多的問題並不表示就是解決得最好的問題。如我們對於禪思想史中頓漸問題，禪者的「遊戲三昧」和戒相等問題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照原來的計劃，除

了本文集所收選的問題，還準備處理宋代禪宗內部語言和明末叢林知識運動兩個主題。儘管我個人在這兩個問題的資料準備和思路都已經大體醞釀好，而目前的處境還無法在短期內完成，只有俟諸來日再作補續。

思想史的問題意識通常與方法論自覺的程度有某種深入的互動。這引導我在從事我的工作之前，對於二十世紀漢語禪學研究的方法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批判。應該說，我批判的資源有來自西方的思想史觀念，但我基本是把這些觀念內在於中國禪學自身的脈絡中來進行思考的。Norman J. Wilson 在他不久前出版的一部關於歷史學的反思性著作中，把思想史的寫作分為二種類型，所謂「觀念史的」(history of ideas)、「脈絡化的」(contextualists)和「新思想史」(new intellectual history)。隨著福科「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在思想史上的廣泛應用，漢語思想史的研究趨勢似乎越來越傾向於後兩類的寫法，而傳統觀念史的「內在理路」則多少有被視為不合時宜。雖然漢語禪學研究還沒有像一般思想史的研究那樣成熟到對於方法的抉擇出現這樣的緊張，但類似的問題遲早會出現。我對於方法論的重視是有限度的，就是說，方法的使用在我的研究中並不具有本體論的優先性，應該由問題來決定方法，而不是相反。現在流行於外緣性的解釋思想，這些新方法本身如果不加以批判地限制，就有可能變成 Bernard Faure 所說的，流於與傳統歷史書寫方式沒有嚴格區別的意識形態的效果。在我的計劃中，除「明末叢林知識運動」準備以外緣性為主來進行寫作，其他可以說都是以「觀念史的」方法

爲主導的。

禪的高推聖境一向是以「不涉理事」爲究竟的，如佛眼清遠禪師說「才作道理，便難會去，須是不作道理始得」。問題是，作爲知識的禪學寫作恰恰是要透過「作道理」的方式來表現禪的精神，這之間的緊張在我們的語境中，有時被人爲地放大了。作爲知識的禪學研究經常會受到來自學術邊緣，或學術之外卻是佛教內部的壓力，很像當年鈴木批評胡適一樣，即主張禪學的研究者必須先取得禪的經驗，才有資格去討論禪學史的問題。這類有關研究者合法性問題的解決，必須釐清職業倫理和宗教倫理的邊界。作爲知識的禪學研究，可以指向或間接地關聯於禪的宗教性經驗，但必須注意，其工作倫理主要還是對「禪的事情」，而不是「禪的本身」進行傳達，就像並不是每位神學家都必須是基督的化現，道德學者也未必都要承擔蘇格拉底或孔子那樣的使命，我們沒有理由強迫所有禪學史的研究都去履行傳授心印一類的責任。作爲知識性的「繞路說禪」相對於禪的深秘經驗或許是遠離一些，這對那些性急著想成佛的人聽了難免不高興。如果借用馬克斯·韋伯所謂現代性的「去魅化」來看，作爲現代學術所要求的規範，禪思想史研究有時不得不暫且懸擱某些無以言傳的高遠意境，把自己的論述域嚴格限制在可以言傳的方面，謙虛地恪守知識生產的規則。於是，在知識與經驗的兩極，一面是要求學者們對於禪的本身或經驗，保持有距離的敬意、尊重和謹慎的表態，大可不必像胡適先生那樣非得生氣地痛罵和尚，而最後讓人覺得，對於禪的經驗，他還是個「門

外漢」；同時，我們的道學家和現代禪師們也無須對知識性的禪學研究過於失望，期待所有禪學史的研究都能夠承擔起拯救性的倫理期望，而泛斥一切非內證性的研究都是戲論魔語。儘管禪的知識未必像經驗那樣直接地受用於身心，而或許仍不失為一種善巧和方便。我們只能說遊戲不同，規則和玩法也不一樣。

應該說，本書所收論文都是在知識生產的規則下進行的，我的對象是職業學者，而有強烈宗教經驗的朋友或許對這樣的寫作感到不滿，這是我不得不先表示歉意的。論文大都是在近五年分別在大陸和台灣的專業期刊上發表的，由於寫作環境和資料收集的變化，特別是自己也正處在學術思考的轉型期，所以各篇論文的寫作風格不盡相同。雖然在同一部書中出現這樣的情況會顯得有些不甚協調，而這次整理，除個別題目略有改動，論文基本維持原樣，我希望借此來表現一些個人學術變化的線索。

本書的緣起可追述到五年前，浙江人民出版社約我寫一部中國禪宗哲學的書，當時我有些躊躇，原因是我不喜歡用「哲學」這個詞來概括禪的思想，儘管我的專業訓練開始於哲學；其次，那時我就決定以寫論文，而不是專著的方式來進行一段時間研究。任務是接下來了，而一味照著自己的工作下去，越來越走樣，結果完全與出版社的初衷不同，書一直沒有辦法完稿，就有了現在的這些論文。首先，我要感謝江燦騰先生，是他直接促使我結集出版這部文集。以前我與江先生素未謀面，卻一直以書信的方式嚴肅地討論學問。江先生的學術

個性很鮮明，是漢語佛學研究中的「狂者」，雖然我們治學的進路和重點不完全相同，而於學術上的不從流俗，不爲鄉愿，大概成爲我們共同的信念。讓我很驚奇的是，江先生對於大陸佛學研究狀況的了解，幾乎和他對台灣佛教的掌握一樣有興趣和深度，即使如我這樣處於大陸主流佛學圈邊緣，而且研究方式還頗有些異類性的人物也沒有逃脫他的視野。去年我有緣與江先生在新文豐面晤，他對我的一些論文有印象，希望我能夠結集成書，就放在他主編的「佛教文化叢書」中出版。記得我是在甚感榮幸的情形下，而又略爲低調地接受了這一建議。出版論文集而不是專著最合我的想法，主要的顧慮是自己有關禪思想史方面的計劃還有些重要的沒有完成，所以當時我只是原則上同意江先生的意見，而在文集的出版時間和內容上則希望他給我幾年的寬限。一年過去了，計劃中仍然有兩個問題沒有落實，而且這樣的工作可能要延後幾年。一次偶然翻檢整理近年發表的論文，發現有關禪學的論述亦有二十餘萬字，原初是準備把自己近年有關中國近現代佛學的一些論文也編排進去，後來江先生建議以純粹禪學方面的論文結集不僅可以主題集中，而且可以朝「新的範式」拓展。儘管江先生以「範式」的高度加以期許可能是處於對我一向缺乏自信的激發，而我個人卻實在感到，這樣的說法很有些叫人以爲小子太輕狂而反倒有點不自在了。一些讀過文稿的朋友們也認爲，其中還是有一些「意見」值得「及時發洩」一下，於是，決定就這樣成了。雖難免有些殘缺的遺憾，卻是提前出版。